中西文化

严复与近代学科*

王天根

[摘要] 就现实与学理的关系而言，严复对近代学科的建构既有学理的追求，又有对现实政治中救亡图存的反思。以 1905 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为界限，严复对近代学科建构可分两个阶段。从甲午战争到清末新政宣布废除科举，严复侧重用狭义的进化论结合学科知识，探求西方富强之缘由。1905 年前后君主立宪得到朝野呼应，严复在学理上将广义的进化论诠释为狭义的社会进化阶梯，从改良层面解释政治制度变革的艰难。在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的选择上，严复以天演进化论为学科理念及对逻辑论证方法的强调，是“不变”的一面。严复对近代学科的建构既有西方学理成分，更有近代世变之亟的困境下实现民族救亡的思路。

[关键词] 严复　近代学科　进化论　救亡图存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06) - 06 - 0018 - 14

Yan Fu and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s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lity and scientific theory, Yan Fu's conception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s was not only the pursuit of theory,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actual politics of "saving the country from extinction." Tak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Civil Examination in 1905 as the watershed, Yan's conception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From the Sino - Japanese War of 1894 - 1895 to the late Qing reforms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Civil Examination, Yan emphasized combining evolution, narrowly defined, with science to grasp the reason for Western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Around 1905, when the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movement was popular nationwide, Yan broadly interpreted evolution and narrowly conceived of natural selection, to explain the difficulty of changing political systems. As for scholarly research and methods, Yan emphasized natural selection and logical reasoning, which showed Yan's "consistency." Yan's conception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s, wa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elements of Western theory, but also the thought of "saving the country" when facing the difficulty of modern social transformation.

中国近代学科的建构与确立，既有西方学科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也有传统学科近代化问题。就前者而言，诸如社会学、逻辑学、美学等一些新学科纷纷在中国教育中得以确立。就后者而言，一些传统学科也进行学科重构，向近代转型，诸如哲学、历史学、伦理学、文学等。不论是前者、后者，皆以进化论作为学科的根本学理。论及进化论，严复著译（特别是《天演论》）是主要的活水源头。由此而言，严复与近代学科的关系不容忽视。严复以进化论为学理对近代学科建构作诸多努力，既有成功方面，也有牵强附会之处，值得深入探索。

有关严复与近代学科理念、学术转型等关系的研究，近年逐步受重视，主要集中以下两点:其一、关于严复的“天演进化论”与近代

[收稿日期] 2006 - 9 - 15
[作者简介] 王天根（1971—），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33

科学的关系。有论者认为严复是“倡导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先驱”，最主要的方面是将天演之学用之于阐发中国社会的进化，使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相结合[①]。该论者还认为严复在学术思想上有其特殊的个性和超群的风格，表现在他好谈天演进化之学，好以“物理”诠释“政理”[②]。其二、严复与近代学术转型的关系。有论者从归纳法、进化论、实证方法等层面，论证严复是推动学术方法近代转型的第一人[③]；还有学者探讨严复与近代学术转型的关系，认为“以西学为范式，完成中国学术由传统向近世的转变，便成为严复大半生的志业追求。”[④]论者认为严复不但倾力鼓吹新学术谱系的建立，还身体力行，致力于各学科的引介和创立。在中国近代各门新学科的初建中，严复多有前驱先路之功[⑤]，主要表现在军事学、翻译学、新闻学、文学、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经济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等方面；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学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⑥]就学科而言，学术转型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新学科的引进，一是传统学科的转换[⑦]。论者还从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特别就史学等学科门类进行简略地阐发。进化论在学科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进化论既是学术现代转型的结果之一，又会反过来有力地推动学术的现代进程。论者认为戊戌时期国人对“学术”价值的空前自觉，是从“开民智”高度着眼的。“开民智”求富强，可谓当时各派思想人士广泛认同的时代强音。严复从“尚学问”与“重事功”两者“相资而不可偏废”的角度，对如何开民智作了回答[⑧]。该论者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范式和传统转型的内涵作了系统、深入阐发，对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转型的整体萌发作了剖析。这一研究成果对笔者研究启发良多。

总之，学界普遍认识到严复与近代学术转型的关系，这涉及进化论与学科理念的问题，但严复学科思想的社会语境也在急剧变化，严复思想本身也在嬗变。其早期与晚年对学科建构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方面研究的不够，特别是严复学科思想与社会语境的关系少有探索，是研究的薄弱环节，笔者试图在这一方面作些探讨。

严复对近代学科的建构有学理的追求，又有对救亡图存的反思。终其一生，严复对近代学科建构思想既针对社会现实进行学理反思，又有与时俱进的一面。而在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的选择上也有“不变”的一面，这又反映了他的学科思想有内在的一致性。严复学科思想就是在“变”、“不变”中得以建构。

就“变”的层面而言，以 1905 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为界限，严复对近代学科建构可分两个阶段。从甲午战争到清末新政宣布废除科举，严复侧重用狭义的进化论结合学科知识，探求西方富强之缘由。1905 年前后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君主立宪得到朝野呼应，严复在学理上将狭义的进化论诠释为广义的社会进化阶梯，从改良层面解释政治制度变革的艰难。严复对学理的建构与近代社会变革寻求理论的支撑密切相关。下文以此为线索，对进化论与严复学科建构思想的关系进行剖析。

一、甲午战争前后寻求富强与严复致力西方学科本土化

针对甲午战争结局，严复发表《原强》、《天演论》等，他从狭义进化论出发，探析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生存斗争学说，以求强国之道。甲午丧师后，严复认识到国家不仅要依靠武力求强，也须实业立国。注重兵战同时，商战也不可忽视，译著《原富》、《斯密亚当传》等从经济学层面探究富国之道。

《天演论》译著与近代学理的关系，王国维撰《论近年之学术界》（1904）有论述：“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学，其所最好者也。”[⑨]严复还译介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等诸多学科。新学科建立是近代学术转型的一部分。他将进化论作学理，为新学科的理论架构奠定基础。

（一）严复对社会学的建构与求强之道

严复是中国社会学学科主要创始者，他对社会学理论有系统的论述。早在 1881 年，严复研读斯宾塞的 *The Study of Sociology*（《社会学研究》），“二十年以往，不佞尝得其书而读之，见其中所以饬戒学者以诚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矣，而于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间，辄为之穷事变，极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变色，俯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10]“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11]严复不从《大学》、《中庸》文本出发，讨论中庸哲学，而是将斯宾塞著作与本土思想“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相印证，“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12]，严复在《原强》中结合中国古代圣贤的话语，称斯宾塞社会学理论：“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13]

甲午战后，严复著译介绍斯宾塞等人的社会学理论：“锡彭塞者，亦英产也，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取以名其学焉。”[14]他将斯宾塞的“群学”思想与荀子“群”的观念相参酌，增加群学思想的中国语感。

不仅如此，严复接受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观点，认为自然进化，社会也进化，“斯塞宾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著《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15]但严复尚不能辨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有何联系与差别，文辞之间尽是对斯宾塞敬仰。严复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认识有个过程。

严复对社会学学科概念的部分表述见其未完译稿《国计学甲部》按语[16]。《国计学甲部》译文：“以群学为之纲，而所以为之目者，有教化学（或翻伦学），有法学，有国计学，有政治学，有宗教学，有言语学。”[17]原著作者齐察理的学科界定方法是将科学划分为群学与格物之学。群学包括教化学、法学、国计学、政治学、宗教学、言语学等，严复表示部分认同。他就《国计学甲部》译文“国计学者，所以论人群之伦脊”[18]作按语：“群学西曰梭休洛支。其称始于法哲学家恭德。彼谓凡学之言人伦者，虽时主偏端，然无可分之理，宜取一切，统于名词，谓曰群学。”[19]

严复亦认可斯宾塞对社会学涵括内容的界定。斯宾塞主张“天下沿流溯源，势因求果之事，惟于群学为最难”[20]，在严复看来，社会学之所以较难，主要表现在“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力学者，所谓格致七［之］学是也。炙［质］学者，所谓化学是也。”仅研究自然科学还不够，因为社会学毕竟是关于人的科学，“何则？所谓群者，固积人而成者也。”[21]“天、地、人三学……三者之中，则人学为尤急切”[22]。论及“人学”，严复从人作为社会个体推及群体、社会，“盖一人之身，其形神相资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而一切政治之施，与其强弱盛衰之迹，特皆如释民所谓循业发现者耳，夫固有为之根而受其蕴者也。”[23]严复看重斯宾塞“人学”理论，显然受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即社群、国家、社会不过是类似生物机体的结构乃至功能的放大，“一群一国之成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故人学者，群学人德之门也。”[24]严复正是运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的理论框架，分析中国自甲午战败后内外局势的变迁。

论及群学这一学科的科学性，严复称：“群学之有公例，而公例之必信，自我观之，且由心志之自繇。脱非自繇，则自然之用不彰，其得效或以反此。夫人事之难测，非曰〈此〉中无因果也，乃原因复杂，难以尽知。而使有人具无垠之智慧，如《中庸》所谓至诚，如佛氏所谓天眼通，则据已事以推未然，真无异畴人之推星变，锱铢分秒，不能违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使非公例，乌能然乎？故即使治此学者，祈向之不灵，前言之不验，亦不过见＜此＞学之精，原因之未得，不可谓人

事无因果，抑科学之无此门也。”[25]严复认为社会学“公例”客观存在，社会学真理性表现在事物发展呈现因果关系；不能因为学者在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就否定事物间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的内在联系。这基本上是《社会学研究》中斯宾塞已表述过的观点。

严复建构社会学依据的学理是社会进化论。严复深受斯宾塞影响，胡汉民称：“严氏之学，本于斯宾塞尔。斯宾塞尔以生物学治群学者也。生物之最大公例曰：与所遇之外缘为体合，物自致于宜，其睽者不可以骤附而强为，故曰任天演自然，又曰在无扰而持公道。缮群者排除其害而群自昌，不悟群理而贪功，则助长之弊甚于不为。此其要旨已见于严氏译述各书。”[26]斯宾塞主张“任天演自然”、“无扰而持公道”等，其根本学理就是进化论。胡汉民概述准确，严复将进化论作著译的学理。

关于群学与天演进化论的关系，1898 年严复在评“曾广铨采译、章太炎笔述”合作翻译斯宾塞的著作《论进境之理》（*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习俗和风尚》（*Manners and Fashion*）时，有所论述，称：“按斯宾塞氏此篇之论，乃其少作，为天演先声，全书嚆矢。其旨欲牢笼万化，并为一谈。读其书者，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27]类似观点又见于严译《群学肄言》：“是书言讨论群学之方，则首以天演为宗绳索。盖群者天演最繁之物也，使天演之旨而有合，则于前人监临降观，昊天旦明，与乎圣贤经世宰物之说，势不得以不分驰。盖彼方谓种族家国盛衰兴亡，一切皆本于天意，抑名世应运者之所经纶，则其仰观俯察，所取一群事变而论之也，自与天演之说大有异。何则？天演者因果相承，质力交推，自古至今，有生长发达萎病老死之可言者也。”[28]严复认为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体系是群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学理是进化论。实际上，严复在学理上对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建构与斯宾塞雷同。

（二）经济学与求富之道

严复著作《原强》、《原强续篇》、《原强修订稿》等介绍达尔文、斯宾塞进化论所蕴含的生存斗争学说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侧重求强，而译作《原富》则为了求富。在严复看来，求富离不开计学（经济学）。严复称：“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用功生民之学。”[29]严复译完生存斗争学说的代表作《天演论》后，就着手《原富》译著，见 1896 年 8 月 26 日吴汝纶《致严复书》：“尊译《天演论》，计已脱稿……尊意拟译穆勒氏之书，尤欲先睹为快。”[30]严复认为斯密的《原富》奠定计学学科基础，“自有此书，而后世知食货为专科之学。此所以见推宗匠，而为新学之开山也。”[31]

所谓学科设置主要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严复称：“计学，亦恭德所指为不能独立成专科者也。虽然，此自理解言之，固如此耳。独分功之事，每降愈繁，学问之涂，定不如此……盖学士用心，当以专论而密，虽明知其物之统于一郛，而考论之时，自以分画为便故也。”[32]严复认为分学科研究学问虽与事物的整体性建构不完全相契合，但学科的设置也为研究的深入带来诸多方便。

对中国而言，西方经济学是舶来品，严复译名反映了他对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理解与把握。严复将 Economics 译成计学，颇费心思，见 1902 年他与梁启超的通信。严复在《原富》的“译事例言”中对译名为何不取“经济学”，而择“计学”有说明：“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33]“计学之名，乃从 Economics 字祖义著想，犹名学之名，从 Logos 字祖义著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称 Economics 而删 Politicar 字面。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正名定议之事，非亲治其学通澈首尾者，其甘苦未必有共知，乍见其名，未有指其不通者也。计学之理，如日用饮食，不可暂离，而其成专科之学，则当二百年而已。

故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无庸讳也。若谓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34]同年，严复致信梁启超，谈及"计学"的翻译，他认为"譬如 Economics 一宗，其见于行文者，或为名物，或为区别。自当随地斟酌，不必株守计学二字也。此如化学有时可谓物质，几何有时可翻形学，则计学有时自可称财政，可言食货，可言国计，但求名之可言而人有以喻足矣。"[35]可见，"计学"也可译成"国计"，严复认为中国旧有经济理论，却无经济学思想。

严复在译著中将经济学说纳入天演学说，加以论述。他认为"治化之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两者害之也……自天演学兴，而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之理，洞若观火。""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矣，亦不以谿刻自敦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以其无所利也。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家最伟之功也。"[36]他认为经济学中功利主义当以不违背天演进化论为前提。严复认为"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37]

严复探究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层面探讨西方富强之学，离不开甲午战争前后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在近代诸多文化精英中，严复较早地重视从学理层面对"强国"之道的探讨。针对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种种败绩，在严复看来，中国的战败不仅是兵器不如人，关键是使用兵器者乃至决策者不如人。中国要强大与富国关键是要重视人，"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38]而人的素质提升离不开学术涵养，"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39]针对甲午战争，严复认为中国战败的主要是当政者不学无术，严复觉得西学是管理民众，治理国家，寻求富强的基本门径。"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40]严复认为中学与西学差距不可同日而语，"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41]严复译著的重要目的是新学启蒙："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42]1897 年严复致信吴汝纶称："今日之变，固与前者五胡、五代，后之元与国朝大异，何则？此之文物逊我，而今彼之治学胜我故耳，然则三百年以往中国之所固有而所望以徐而修明者孑遗耗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此抑或为复所过虑，或经物竞天择之后吾之善与真者自存，且有以大俾西治，未可知也。）"[43]。"许序《天演论》，感极。……郑侨有言：'吾以救世也。'"[44]严复译《天演论》以言志。《天演论》倡导的社会进化论为晚清社会变革提供学理上的合法性、可能性。同时《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成为诸多学科学理支撑。

二、清末新政前后探索政治变革道路与严复促进传统学科的近代转型

甲午战败被国人视作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的失败，严复是个善察时变的文化精英，发表《天演论》、《原强》、《原富》等寻求富强之道。1905 年前后，严复探索富强的社会语境发生巨大的变化，他走出了仅从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的藩篱，着手从政治制度上探究西方富强之缘由。

1905 年前后清末新政重要内容是君主立宪。政治制度变革需要学理作支撑，以证明变革的合法性、可能性。严复以君主立宪思想为核心，从学理上对中国传统学科进行重构，其中包含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等。就近代学科建构而言，这些学科并不完全从西方引进，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已有这些学科思想。结合西方进化论思想及西方君主立宪等政治变革进行专业化处理，严复作了诸多贡献。

严复在学理上的转向不仅与中国现实变革密切相关，也与世界格局变迁密切相关。1904 年冬，严复赴英国办理开平煤矿讼事。1905

年1月6日抵达英国。据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记载："归国途至法兰西、瑞士、罗马各处游览，折至意大利之稽诺亚，登德国邮船东归"[45]。严复出国期间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因为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而战，严复对此特别关注[46]，严复以日俄战争为参照系发表《原败》等著述，仍与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相结合。在严复看来，"今夫俄之败者，非日本之能败也，其十七八皆俄自败之"[47]。主要原因在于俄国"政令军实"腐败，而日本战胜实出乎世人所预料，"及其既定，知与不知，莫不惊叹"[48]。从而"知黄白种界之说，不足复存，而欧亚潮流，行将转耳。此日本近者战功所为最伟也"[49]。日胜俄败，严复以此说明立宪对专制的胜利，总结其对中国社会变革可资借鉴之处。

（一）政治学与近代政治变革

严复将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比照，1905年9月20日至10月4日，严复在《中外日报》刊载《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50]，探析日本两次获胜的原委，云："往者甲午中东之役，英人威公使妥玛犹在，此公于中国战籍颇有研究之功，知黄人教化本源之盛大，归国后，于泔桥国学主华文讲席。闻其事，蹶然曰：'此近世莫大之战争也，此非中日之战，乃泰西东新旧二教化之战也。'已而东果胜中果败。自此以降，维新之说遍于吾国中焉。近者甲辰日俄之战，知微之士闻之，亦曰：'此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二治术之战也。'自海陆交绥以来，日无不胜，俄无不败。至于今，不独俄民群起而为立宪之争也，即吾国士夫亦知其事之不容已。是以立宪之议，主者愈多，远猷辰告始于出使诸公，继者乃有疆吏，而今枢臣亲懿之中亦稍稍持其说矣。"[51]两次战争中，日本对中国、俄国的胜利，在严复看来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的胜利。

1906年译著《政治讲义》标志着严复政治学理论的成熟。原著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为 Sir John Seeley 给学生上课的讲义[52]。译著《政治讲义》常有严复的发挥，严复的政治学理论多见此。

在政治学学科建构上，严复称："政治一学，最为吾国士大夫所习闻。束发就傅，即读《大学》、《中庸》。《大学》由格致而至于平天下，《中庸》本诸天命之性，慎独工夫，而驯致于天下平。言政治之学，孰有逾此者乎？"[53]严复对政治学概念的把握并没有完全偏离传统文化经典"四书"，他提倡"格致"及"慎独"功夫。他认为中国古代就有政治学学科，"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此西国政治所以成专科。问中国古有此乎？曰有之。如老子，如史迁，其最著者。而《论》、《孟》、《学》、《庸》，亦圣人见其会通，立为公例，无疑义也。"[54]

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严复在《政治讲义》中称，"政治问题曰国家"[55]。在严复看来，"近者吾国国家，方议立宪，立宪非他，即是众治"。由此而论，专制、立宪权力源于社会基层，"其为群下所拥戴既同"[56]，译著从社会舆论层面对专制与立宪差异进行分析。"舆论者，拥戴之情之所以宣也。专制之政府，无以为宣达测视舆论之机关，而立宪之政府有之。一令之行，一官之立，舆情之向背，不独显然可见也，而多寡之数，亦至著名。其向背与多寡，皆于议员之出占投票而得之。"[57]"此谓舆情向背多寡，有议院以为宣达测视之机关者，即无异言国民得此，而有其建立维持破坏之机关也。"[58]比照原著：So far, then, despotism and government by assembly, even in its most recent, most frank, and candid form, agree. In what then do they differ? Surely in this, that in the modern system public opinion expresses itself and is ascertained by fixed rules and through certain recognized channels. The favour of the public is recorded, and at the same time measured, by a majority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and a change in favour of the public by change in that majority. [59]（笔者译文：通过近来坦诚而率真的表述可见，专制及民主政治皆通过大众来运作的，这是勿庸置疑的。两者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通过现代系统性的公共舆论表述及部分公认的渠道，大众舆论导向被记录并进行计量分析。舆论通过议院（投票）之多寡得以表述，议院投票之多寡也随舆论而有所变化。）This may be expressed in one word

by saying that public opinion has an organ by means of which it makes, supports, and destroys the government. [60]（笔者译文：可用一句话简而言之，大众舆论有个宣泄之组织，通过它，舆论可以产生、支持或颠覆政府。）严复认为“此为政治学最紧要之公例”[61]。可见此政治学公例是西莱的著述，非严复原创。

严复对此公例进行阐述，“无论何等国家，其中皆有此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权力。建立者，由无而使有；维持者，由有而使存；破坏者，由存而使亡。此种权力必有所寄，在民，在兵，在本国，在外国；为公，为私，为善，为恶，无不可者。但此种权力，有得其机关，其力有以达者；亦有不得机关，其力散漫隐伏，无以达者。虽然，散漫隐伏矣，而政府之立仆必视之。”[62]严复还从反面论证，“今假向日维持政府之权力，以有因缘，坐而中变，此即言政府所倚其扶立拥戴以为存者，乃今不愿扶立拥戴之。然坐无机关，此变未由宣达，而居上之人，亦坐无此机关，未由测验，懵然不知。诸君试思此时国家现象，要当何如？曰：此如汽箱，外无汽表，早晚炸耳。炸者何？乱也。炸者何？革命也。此革命而乱者，皆坐无以为宣达测验舆情之机关耳，皆坐无国会议院耳。”[63]比照原著：This is what we call revolution. It is the chaotic outbreak of the government - making power, for which no organ has been provided. [64]（笔者译文：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革命，国家权力机关在混乱中被颠覆，因为它没有提供舆论宣泄组织。）可见，严复作了大量发挥。严复总结说：“有无议院国会为建立破坏政府之机关，专制立宪二政府不同在此。”[65]严复对中国近代政治学学科建构有别于西方以“自由”为理念的“民主”制度，他反对革命，主张建构所谓稳健的“立宪”制度。

总体上看来，严复对政治学学科的建构既有参酌西莱的政治学成分，也有自己学理上的深思，更有对现实政治的反省。自1905年晚清预备立宪到民国元年的民主共和，社会制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但严复对共和制度并不看好，他在学理上没有放弃对立宪的思考与探索，1912年底自北大离任后，针对清末民初之交的政治思潮，严复颇有见地指出：“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催杀破坏，不可亿计。此等浩劫，内因外缘两相成就，故其孽果无可解免；使可解免，则吾党事前不必作如许危言笃论矣。顾此等皆天行演［天演行］淘汰之见诸事实者，淘汰已至，而存立之机见焉。”[66]严复认为鼓吹极端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浩劫，他用“天演进化论”中优胜劣汰思想，分析浩劫原委。

反观现实政治，他认为以天演进化之学理，根除国民劣根性，中国富强之道才有所指望，“西人谓华种终当强立，而此强立之先，以其有种种恶根性与不宜存之性习在，故须受层层洗伐，而后能至。故纯如欲问中国人当受几许磨灭，但问其恶根性与不宜之性习多寡足矣，二者固刚刚相掩也。然此乃指社会拓都而言，至于小己么匿之祸福，则庄子所谓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矣。”[67]

（二）政治道德的评判与严复对伦理学探索

严复学科思想的变迁与时俱进，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被严复等学人视作日本学习西方的胜利，西方器物、制度、文化在严复思想中大放异彩。严复对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首倡之功，表现在他将人性的善恶观与西方的“开明自营”观念相参酌，并将其置于社会进化论的分析框架。

严复在《天演论》中不但称道斯宾塞的宇宙进化论，而且利用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反驳赫胥黎的人性本善、人类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以及伦理对社会的调控不同于自然进化等思想观点。在伦理与生存斗争学说上，严复倾向斯宾塞的天演进化学说，认为伦理不宜遏制竞争，反对赫胥黎在《进化与伦理》中对伦理的偏重。他痛訾中国传统伦理，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严复对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主要表现在他对进化的侧重，但对西方功利主义思想也不是一味汲取，而是有所选择。

严复从学理上对近代伦理的建构还与现实世界社会变革密不可分。1904—1905年，严复再度走出国门，西方严重的社会问题使他颇

为失望，他不再像以前，言必誉西方，“夫西人所最讲、所最有进步之科，如理化，如算学。总而谓之，其属于器者九，而进于道者一。且此一分之道，尚必待高明超绝之士而后见之，余人不能见也。故西国今日，凡所以为器者，其进于古昔，几于绝景而驰，虽古之圣人，殆未梦见。独至于道，至于德育，凡所以为教化风俗者，其进于古者几何，虽彼中夸诞之夫，不敢以是自许也”[68]。他对西方德育教化是否有所进步深表怀疑，他甚至认为西方社会仅存的一分之“道”尚有问题。为何“器”是九分进步，而“道”乃至“德育”出了问题呢？“惟器之精，不独利为善者也，而为恶者尤利用之。浅而譬之，如古之造谣行诈，其果效所及，不过一隅，乃自今有报章，自有邮政，自有电报诸器，不崇朝而以遍全球可也，其力量为何如乎？由此推之，如火器之用以杀人，催眠之用以作奸，何一不为凶人之利器？今夫社会之所以为社会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恃有人伦耳！”[69]严复重申“天理”、“人伦”与社会维系的关系，“天理亡，人伦堕，则社会将散，散则他族得以压力御之，虽有健者，不能自脱也。”[70]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赫赫战绩，而作为典型的西方帝国俄国的战败迫使严复重新评估东方道德文明，故严复在《中外日报》中发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对中国社会伦理重评：“名教是非之地，诸公（对象主要是学生——笔者注）之学问阅历，殆未足以自出手眼，别立新规。聚闻新奇可喜之谈，今日所为极是者，取而行之，情见弊生，往往悔之无及，此马文渊所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则不如一切守其旧者，以为行己与人之大法，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71]严复还强调，“东西历史，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前若罗马，后若印度、波兰，彰彰可考，未有国民好义，君不暴虐，吏不贪污，而其国以亡，而为他族所奴隶者。故世界天演，虽极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终为复载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则百世不惑者也。不佞目睹今日之人心风俗，窃谓此乃社会最为危岌之时，故与诸公为此惊心动魄之谈，不胜太愿，愿诸公急起而救此将散之舟筏。惟此之关系国家最大。故曰德育尤重智育也。”[72]道德重建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严复主张育德于教。1912 年，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倾向“中西学”分科而治，“旧学”专务伦理教化等，“比者，要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年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73]。是年底，严复在《与熊纯如书》中称：“西人谓华种终当强立，而此强立之先，以其有种种恶根性与不宜存之性习在，故须受层层洗伐，而后能至。故纯如欲问中国人当受几许磨灭，但问其恶根性与不宜存之性习多寡足矣，二者固刚刚相掩也。”[74]严复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寻求民族强盛联系在一起。

严复后期重提本土伦理教化，其重要目的是要把近代意义上的国会议员塑造成谦谦君子。他在 1913 年 5 月 21 日北京《平报》所刊《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称：“夫中国者，数千年君主之国也……秦汉以来，号为专制，顾此二千年之中，岂乏英明贤能之君，强盛休明之代！即在叔季，一朝士大夫，亦分清浊。其有志救世者，莫不信言谨行、克己慎仪、一身隐然为苍生所托命，此反正之所以有资，而国种不至于沦散者，正赖此耳。嗟乎？(!) 此非公等所唾弃鄙夷，目为专制时代之人物者耶！”[75]“由是而言之，是数百千人之议员，各以一身而为尧、舜、禹、文之一分子，其自视宜何若？即不能尧言舜趋，人人齐圣，于以成中天景运之休，以跂彼西人所谓理想之郅治，而但望以稍存士君子之风，廉隅敬恭，和悦而诤，使吾侪小人，得一专制时代恭俭之中主，以为身家所托庇，此其所愿，亦至不奢已。”[76]严复不但鼓吹“专制”的优越性，而且认为国会议员须有本土传统社会伦理所熏陶下的“士君子”风度。

严复在现实政治反思与道德评判中建构近代伦理学。“他日读《论》、《孟》、五经，其中所言，大抵不外德行、政治两事——两事者，固儒家专门之业也。”[77]严复曾就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伦理政治认识不清予以抨击，1916 年他在《与熊纯如书》中称：“至挽近中国士大夫，其于旧学，除以为门面语外，本无心得，本国伦理政治之根源盛大处，彼亦无有

真知，故其对于新说也，本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何则？以其中本无所主故也。”[78]

严复关于伦理与政治关系的探讨与时代变迁有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强国打强国的世界大战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另一次幻灭，也是对社会伦理的一次严重挑战。战争的重要影响是强国的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教化，不再是弱国文化精英学习的对象，既无学习目标，回归传统，重新诠释本土道德理念逐步成为时尚。再加上国内袁世凯复辟，严复等文化精英对中国传统社会理论进行了新的思考。严复在 1916 年 12 月的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第 1 卷第 4 期上发表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中国古代政治性社群历史述评》[79]）。

严复称：“古老的中国政治思想有个很大缺陷，即它从不敢公开地宣扬行政法则（the art of government）与伦理道德（morals）是两码事……一旦政治和伦理或道德哲学纠缠不清时，就不可能得出一个非常公正的结论。（you cannot come to a sound conclusion with Politics intermixed inextricably with Ethics or Moral Philosophy）”[80]严复晚年主张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移植到中国，同时保留传统的儒家伦理教化；还要做到将英国式政治制度与本土传统伦理教化截然分开。

（三）社会兴衰论与严复对历史学重建

严复认为历史学既属自然科学，又属社会科学。严复对历史学是否是专门学科表述语多歧见，“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及“盖二学相表里，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81]。从学科角度而言，“历史者，所以纪录事实，随所见于时界而历数之”。因此，严复对史学有诸多论述。

就史学研究对象与社会兴衰论的关系，严复指出：“读史有术，在求因果，在能即异见同，抽出公例。此不独读史宜尔，即抑观俯察，人欲求智，莫不当然……如求治乱盛衰之故，则专意在此，而置其余，他日再读。”[82]研习历史专意“求治乱盛衰之故”，这与译著《政治讲义》的原著作者西莱论述契合，“There is regularity in human affairs; the same causes will in the main produce always the same effects ; *evidently*, *therefore*, *he who wishes to be* wise, since wisdom consists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of causes and effects, cannot do better than inquire into the past experience of mankind, or, in other words, cannot do better than study history.”[83]（笔者译文：世事变迁有规律；相同的原因常导致相同的结果，因为智慧存在于对原因与结果的关系把握中，谁想变得有智慧，莫过于探究人类过去的经验，换而言之，莫过于探究历史。）“虽然，科学日出，史之所载日减于古矣。而减之又减，终有其不可减者存，则凡治乱兴衰之由，而为道国者所取鉴者。”[84]

严复所谓社会兴衰论建构在进化史观基础上，有别于中国王朝兴亡盛衰论，严复对历史循环论有所论述，严复注重探讨政治性社群的政治、伦理取向与王朝盛衰周期律的关系。严复归纳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这一兴衰更替的王朝周期律：唐朝“仍有不可避免的政治怪圈：好政府产生美德；美德——和平；和平——懒散；懒散——混乱；混乱——毁灭。”（there is an inevitable political cycle that good government produces virtue ; virtue, peace; peace, idleness ; idleness, disorder; and disorder, ruin.）[85]在严复看来，王朝盛衰周期律由宋至当下的时代一直在运行。

严复认为以往探究历史缺乏用进化论的目光，“吾国旧学界思想，视历史为传古信今之述作，而不知为现在社会生活之原因，研究历史者，亦不过出于钩稽事实、发明体例二途，而不知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86]。相比较而言，严复对西方撰著运用进化史观称誉有加。1909 年 2 月 25 日，严复在《泰晤士 <万国通史> 序》称：“顾其纂辑非若类书然，徒取各国史籍，译而丛聚之也。乃以天演文明，为之主义，根荄主干，枝叶派分……学者生今之世，欲识人群进化阶级，据往事推来者，舍是书盖莫属也。”[87]即从中可以窥探人类历史进化轨迹，从而做到“据往事推来者”。“究文明之进步，求世变之远因，察公例之流行，知社会

之情状，欲学者毋忘前事，资为后师，用以迎蜕进之机，收竞存之利，则求诸古人著作，或理有不逮，或力所未皇。此十八世纪以降之史家所为远轶前修，而其学蔚成专科，最切于人事而不可废也。”[88]严复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审视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提出：“惟吾意不薄草昧而厚文明，故其视国家也，亦与前人异。前人以此事为文明之所独有，故其视政法本于人为，犹之六书、文字；吾人视之，则犹语言，非人之能为言也，乃人之不能无言也。文明之语言胜于草昧远矣，顾不得谓草昧者为不能言。草昧亦有君臣，故草昧亦有政府。政府同而所以为政府者大殊。吾今欲进而论之，意将由吾意中设最美之目的，以后递验古今所有各政府，几人达此目的，几人未达，而后治乱盛衰有可论乎？顾此法前人多有由之，即其所谓最美目的，真不胜其繁也。”[89]严复将社会兴衰论与进化史观联系起来。“草昧社会之所争，与文明国民之所求，二者其为物大异，而欲知其主义，当察诸社会转变之秋。故其始则与宗法与初出之神权争存也。迟之又久，则政权又与神权争存也。”[90]

就社会现状而言，社会分工愈细，学科专门化愈具体，专门史日多，而通史不及前人之详细。对于断代史，严复肯定其长处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然则通史之作，又乌可已乎？”严复称：“盖自达尔文、斯宾塞提证天演之说，于是言人群者，知世变之来，不独自其相承之纵者言之，必后先因果，倚伏召从，无一事之为偶也；乃自并著之横者观之，亦远近对待，感应汇成，缺一焉则其局不见。故欲言一民之质文强弱，一国之萌长盛衰，独就其民其国而言，虽详乃不可见，必繁俗殊化，合叙并观，夫而后真形以出……”[91]在严复看来，达尔文、斯宾塞等提出进化论观察视角，人类的社会史发展演变规律才得以彰显。

三、以天演进化论为核心的学科理念与严复对逻辑论证方法的强调

严复学科思想既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以天演进化论为学科理念及对逻辑论证方法的强调，是“不变”的一面。这显示其学科思想的内在一致性。

（一）批评传统义理、考据与严复对进化论、归纳法的推崇

不论是求强还是求富，严复在学理上师法西学，摒弃汉、宋之学。严复称宋学“侈陈礼乐，广说性理”，严复认为“一言以弊之，曰无实”[92]。他讥讽所谓宋儒的道学，云：“夫学术之归，视乎科举；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实惟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93]“夫支那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辈人才，为术密矣，为时久矣，若辈之多，自然之理。”[94]结果，甲午之战中国为日本所败，“支那与日本种相同，而教亦相若，乃以十倍之地而不及日本者，非视此辈之多寡，为国势之盛衰耶？故愿有事权者遇此人，毋使事权落此人之手；有子弟者遇此人，毋使子弟听此人之言。”[95]严复也批评汉学，“薄讲章者，则标汉学考据之赤帜。”严复称之为“无用”[96]。在论证方法上严复对考据学反思，倾向西方实证主义，对归纳法、演绎法等逻辑学特别侧重。

中国逻辑思想史源远流长[97]。Logic（逻辑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98]。逻辑学早期被译成“名学”，有史料表明肇始于严复，商务印书馆在其出版的“各种教科书”目录中称：“论理学吾国旧译辨学，近人侯官严氏以其学精深广大，译为名学，方与本义相副。”[99]穆勒著述有：“名学者，所以讨论人类心知，以之求诚之学；将可以赅心德之用，而亦不悖于古，不戾于俗矣。”[100]严复作按语：“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如斐洛罗支之为字学，唆休罗支之为群学，什可罗支之为心学，拜诃罗支之为生学是已。精而微之，则吾生最贵之一物亦名逻各斯。（《天演论》下卷十三篇所谓‘有物浑成字曰清净之理’，即此物也。）此如佛氏所举之阿德门，基督教所称之灵魂，老子所谓道，孟子所谓性，皆此物也。”严复参酌中西学，对逻各斯概念溯源，“逻各斯名义最为奥衍。而本

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广大矣。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税务司译有《辩学启蒙》。曰探、曰辩，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101]严复回顾由逻辑思想发展到名学的历史，阐释定"名学"译名之原委。朱执信也称："中国之人，自来无有论理学。"[102]"中国则自明李氏（李之藻）译《名理探》始，暨艾氏（艾约瑟）译《辩学启蒙》，皆不行于世。严氏（严复）译《名学》后，世乃知有一科学，为思之法则尔。"[103]作为有思想的翻译家，严复主要通过译著对西方逻辑学进行介绍与诠释。

严复为近代中国逻辑学创始人之一。他对逻辑学的建构既有西方归纳法、演绎法的学理，郭斌在《严几道》中称："吾国逻辑之学素不发达，思想笼统，成为心习。先生（严复）首先翻译西洋逻辑名著，提倡慎思明辨之风，其功实伟。"[104]同时又含有中国传统"名学"思辩，严复认为："此科所包至广，吾国先秦所有，虽不足以抵其全，然实此科之首事；若云广狭不称，则辩与论理俱不称也。"

严复对中国近代逻辑学学科的建构，其一通过翻译西方逻辑学著作。《名学浅译》原著为耶方斯的 Primer of Logic[105]，商务印书馆在书目"论理学"栏有《名学浅说》简介："凡讲求学问者不可不知名学，故西人称曰智门之键，严氏前译穆勒《名学》，久已行世，初学者或以艰深为苦，严氏又译是书，卷帙较少，理论较浅，虽所用名词多出于创，而解释务求平易，学者先读是书则不以治名学为难事矣。" 为促进国人对西方逻辑学理解，1900年严复在上海开"名学会"，讲逻辑学[107]。严复早期的逻辑学思想见于《天演论》。徐维则将艾约瑟译著与傅兰雅著《理学须知》比较后，称傅著："其书专揭分析事物之法，于理学为论辩，于辩学为理辩，与艾约瑟所译《辩学启蒙》相出人，而文词之明白过之。学者欲穷格致之要，宜读此以植其基，而旁考《西学略述》中之言理学与赫胥黎《天演论》下卷，以穷其流，于真理庶乎无疑。"[108]可见，就中国近代逻辑学的建构而言，近代学人认为《天演论》是重要著作之一。其二通过中西文化会通。严译《天演论》对中国近代逻辑学建构的贡献，在于将西方逻辑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结合起来。严复在《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称："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追治西洋名学，见其所以求事物之故而察往知来，则有内导之术焉，有外导之术焉。内导云者，察其曲而见其全者也，推其微以概其通者也；外导云者，据大法而断众事者也，设定数而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此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即彼所谓外导是已；所谓推见至隐，即彼所谓内导是已。迁之言若诏之矣。此即物穷理之最要二途也。而后人漠然视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109]

严复关于逻辑学学理除见于《天演论》、《名学浅译》，尚见于1905年严复译《穆勒名学》上半部分。《外交报》第11号（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刊有"金粟斋译社出版广告"评介《穆勒名学》，称："名学，英国硕学穆勒约翰箸（著），侯官严几道先生译。名学者，致知明辨自明而诚之学也。夫人之尊于群动，亦赖有致知明辨之能力以推证事物而施之于用耳。所知愈广，所辩愈审者，其文明之程度亦愈高，而名学实为致知明辨之要术。自希腊古德亚理思大德氏以还，治此学者綦众，晚近遂列为专科，极深研几，而穆勒氏之作最为精深博大，今此书译传，诚不啻学界中熟食、除冥之炬火也。"[110]

严复注重逻辑学中归纳法、演绎法本身，他特别强调归纳法，"苟必始于知物，则所由内籀之术明矣。内籀必先考求事实，考求事实则一切如《群学肄言》之所戒，皆必除之而后可。"[111]就方法论而言，严复倡导"盖人天生人，与以灵性，本无与生俱来预具之知能。欲有所知，其最初必有内籀。内籀，言其浅近，虽三尺童子能之"，严复又将归纳法、演绎法置于进化论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论及"天演"

与归纳、演绎的关系，严复称《穆勒名学》中“所言下生阅历生慧一说，与天演家之言异。天演重种习，自物竞天择之用，故存者之知避害，皆出于自然而利生，不必其能推而有所记也。二者以言其中灵者如犬、马、狐、雁可耳，至于下着殆不然也。”[112]

（二）归纳法与近代学科理念的论证方法：以政治学、历史学为案例

在治学路径中严复批评汉学之所谓“考据”，强调西方的实证方法。严复将归纳法引入学科理念的逻辑论证，特别是进化论学理相结合，终其一生，这一点基本上未变。这是严复学科思想内在一致性的表现。

归纳法与政治学研究。政治学是群学之一科，治政治学的方法同于治群学。这些方法是什么呢？在严复看来，“吾人考求此学，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是比较术，是内籀术。”[113]“祇缘吾党以历史天演涂术，讲求政治，故其取社会也，须由其最初，不得以其未进文明而弃之也。”[114]治政治学在方法上“所与古人异者”必须特别强调，要用“西学最新最善之涂术。何则？其涂术乃天演之涂术也。”[115]，比照《政治讲义》底本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认为生物学研究的方法同样适合于分析国家政治，“the theory of evolution can be applied to states.”[116]（笔者译文：进化理论可以用于分析国家。）因为“国家是天演之物，程度高低，皆有自然原理”，“国家既为天演之物，则讲求政治，其术可与动植诸学，所用者同。”[117]严复称：“或曰：政制者，人功也，非天设也，故不可纯以天演论。”“是不然，盖世事往往虽为人功，而不得不归诸天运者，民智之开，必有所触，而一王之法度，出于因应者为多。饮食男女万事根源方皆以此为由所设施者，出于不自知久矣，此其所以必为天演之一物也。”[118]严复认为政治制度是“天演进化”的产物。严复对政治学、历史学的阐释与建构，在治学路径上仍是归纳法、演绎法，其学科理念仍是天演进化论，这一点与其前期对近代新学科的建构并无二致。

归纳法与历史学研究。历史研究根据史实，“推籀因果揭立公例者之所讲求也，非专门之学也。”[119]严复探讨归纳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一人之阅历有限，故必聚古人与异地人之阅历为之。如此则必有纪（记）载，纪载则历史也。”[120]因此，“是故历史者，不独政治人事有之，但为内籀学术，莫不有史。”[121]严复通过辨析归纳法与史学的关系，以论证史学的科学性。1906 年 8 月 10 日，严复读《历史教科书》两编后，致夏曾佑的信中称：“读足下之书，见提挈立例处，往往见极因怪，（如云“中国之教得孔子而立，政得始皇而行，境得汉武而定”，又云“使匈奴盛于周时，中国必亡”诸语。）此法惟近世西人以天演服【眼】藏探内籀之术以治前史者而复能之，乃大著不期而与之合，此滋足贵也。”[122]可见，严复认为将归纳法等逻辑学方法纳入到进化论理论分析框架中才可能重构历史。

四、近代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与严复对学科学理建构的意义

近代学术资源既有中国传统的，又有西方传入的。同时学科知识的专门化导致的知识分割，使得整个学术体系在基本的理论预设及学理的一致性上遭遇困难。就学科而言，西学进入近代中国则以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文科，以物理学、化学、数学等理科呈现。随着西方学科概念的引入，国学也逐步被纳入西方的学科体系中。不论是社会学科中“政理”，还是自然学科中“物理”，皆以进化论作为学理，只不过“物理”依据的是生物进化论，“政理”依据的是社会进化论。无论是从社会语境，还是从中国学术史及思想史这一文本语境，考察进化论与近代学术转型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在清末民初存在近代化的问题，西方学术资源在近代中国面临本土化的问题。传统学术资源的近代化、西方学术资源的本土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在近代中国的学科体系建构过程中既有共同点，又有学术分歧。共同点的主脉是进化论，分歧是知识作为血肉被不同的学科体系分割。进化论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下肩负着世界观与方法论双重的使命。严复对近代学科建构

离不开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他以追求富强为目标，以天演进化论为学科理念，以归纳、演绎为学理论证方法，探究近代政治变革的学理依据。其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关系，特别是对近代学科的逻辑建构，对传统学科的近代转型，既有西方学理成分，更有近代世变之亟的困境下实现民族救亡的思路。

＊此为王天根主持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之一。

①②周济:《倡导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先驱》,《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版,第 41 页、第 43 页。

③李承贵:《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近代转型:兼论严复对传统研究方法近代转型的贡献》,黄瑞霖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方志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第 26 页。

④⑤郭卫东:《严复与近代学术转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第 234 页、第 238 页。

⑥⑦⑧黄兴涛、胡文生:《论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兼谈清末民初学术转型的内涵和动力问题》,《清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静安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76 年版。

⑩严复:《译群学肄言序》,[英]斯宾塞著:《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vii 页。

⑪严复:《译余赘语》,《群学肄言》,第 xi 页。

⑫㊳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一),第 18 页、第 29 页。

⑬⑭⑳㉑㉒㉓㉔见《原强》,《严复集》(一),第 16 页、第 6 页、第 6 页、第 7 页、第 7 页、第 7 页。

⑮《天演论》"导言一",按语。《严复集》,第 1325 页。

⑯《国计学甲部》究竟何时翻译,现在学界并不清楚。《严复集》(四)称:"《国计学甲部》,法国巴黎法典学堂讲师齐察理原著,严复翻译,原著及翻译的时间均未详,可能是早期的翻译,仅译 3000 字左右便终止了",第 847 页下注脚。

⑰⑱⑲㉕㉜(119)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严复集》(四),第 847 页、第 847 页、第 847—848 页、第 848 页、第 847 页。

㉖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 2 期,参见王栮、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选》(第二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45 页。

㉗《严复集》(一),第 92 页。

㉘《群学肄言》,第 298—299 页。

㉙《天演论》(富文本),王庆成主编:《天演论汇刊三种》,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 1998 年 9 月版,第 273 页。

㉚《严复集》,第 1559 页。

㉛㉝㊲严复:《译斯氏〈计学〉例言》,《严复集》(一),第 98 页、第 97 页、第 99 页。

㉜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见《严复集》(四),第 847—848 页。此处引文为严复在原书:"国计学者,所以论人群之伦脊。而是伦脊,则专关于养欲给求,与一切民力之从于利实而后动者。至于他端,非吾事矣"所作的按语。

㉞㉟严复:《与梁启超书》(二),《严复集》(三),第 517—518 页、第 518 页。

㊱严复:《原富按语》,《严复集》(四),第 858—859 页。

㊴㊵㊶严复:《与长子严璩书》(一),《严复集》(三),第 780 页、第 780 页、第 780 页。

㊷严复:《与张元济书》(二),《严复集》(三),第 527 页。

㊸㊹严复:《与吴汝纶书》(一),《严复集》(三),第 521 页、第 522 页。

㊺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三),第 1550 页。

㊻他于 1905 年 9 月 3 日《外交报》第 120 期上发表《原败》及 1906 年 2 月至 3 月间《外交报》第 133、134、135 期上刊载《一千九百五年寰瀛大事总述》。

㊼严复:《原败》,《严复集》(三),第 163 页。

㊽㊾严复:《一千九百五年寰瀛大事总述》,《严复集》(三),第 170 页、第 171－172 页。

㊿《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后转载于《直隶教育杂志》第 1 年第 13 期和第 14 期(1905 年 9 月 29 日和 10 月 13 日),参见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台湾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 1998 年 9 月出版发行,第 131 页题注。

(51)《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第 131 页。

(52)参见清华大学戚学民博士论文:《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和理论意义》。

(53)(54)(55)(56)(57)(58)(61)(62)(63)(65)(77)(82)(84)(89)(90)(114)(117)(120)(121)《政治讲义》,第 1242 页、第 1244—1245 页、第 1247 页、第 1313 页、第 1313 页、第 1313 页、第 1314 页、第 1314—1315 页、第 1243 页、第 1244 页、第 1244 页、第 1253 页、第 1269 页、第 1260 页、第 1245 页、第 1244 页、第 1244 页。

(59)(60)(64)(83)(116)Sir John Seeley: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01, P192; P193; P192; P4; P20。

⑥⑥⑦⑦⑦④严复:《与熊纯如书》(八),见《严复集》(三),第608 页、第 608 页、第 608 页。

⑥⑧⑥⑨⑦⓪⑦①⑦②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一), 第 167 页、第 167—168 页、第 168 页、第 168 页、第 169 页。

⑦③严复:《与熊纯如书(三)》,见《严复集(三)》, 第 605 页。

⑦⑤⑦⑥严复:《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见《严复集》(二),第 324—325 页、第 325 页。

⑦⑧严复:《与熊纯如书(三十九)》,见《严复集》(三),第648 页。

⑦⑨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孙中兴教授发现此珍贵的英文文献,他仅将文章的标题译为"中国古代政治结社小史",此译法有待商榷,Societies 在此处是名词,译为"结社"似不妥。孙中兴教授译法见王庆成等人主编:《严复合集·严复文集编年(四)》,台湾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 1998 年 9 月出版发行,第 994 页,注解部分。

⑧⓪⑧⑤Yen Fuh,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 published i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issued in No. 4 in 1916

⑧①比照西莱讲义:"History without political science has no fruit; Political science without history has no root."(Sir John Seeley: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01, P4)

⑧⑥浮田和民著、杨毓麟著:《史学原论》,《游学译编》,第 3 期,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转引自左玉河著:《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50 页。

⑧⑦⑧⑧⑨①严复:《泰晤士 < 万国通史 > 序》,《严复集》(二),第 269 页、第 270 页、第 270 页。

⑨②⑨⑥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一),第 44 页、第 44 页。

⑨③⑨④⑨⑤严复:《道学外传》,王栻主编《严复集》(二),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第 1 版,第 484 页、第 485 页、第 485 页。

⑨⑦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辩术名重一时,但这不代表中国就有逻辑学,王国维指出:"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足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参见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 96 号(1905 年 4 月)。

⑨⑧孙中山指出:"近人有以此学用于推论特多,故有翻译论理学者,有翻为辨学者,有翻为名学者,皆未得其至当也。夫推论者,乃逻辑之一部,而辨者,又不过推论之一端,而其范围尤小,更不足以括逻辑矣……夫名学者,乃'那曼尼利森'(nominalism,今译唯名论)也,而非'逻辑'也……夫名学者,亦为逻辑之一端耳"。(《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文学说)》,参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29 页。)

⑨⑨⑩⑥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第 1 版,第 237 页、第 330—331 页。

⑩⓪⑩①⑪②穆勒著、严复译:《穆勒名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6 页、第 4 页、第 155 页。

⑩②⑩③朱执信:《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论革命之谬》,《朱执信集》(上集),中华书局 1979 年 1 月第 1 版,第 70 页、第 70 页。

⑩④参见《国风月刊》第 8 卷第 6 期(1936 年)。转引自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 200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19 页。

⑩⑤早在 1896 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将 Primer of Logic 译为《辩学启蒙》,(参见《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第 264 页。)1909 年严复译耶方斯的《名学浅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⑩⑦与会者有张元济、郑孝胥、吴保初、章太炎等。参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238 页。

⑩⑧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理学第二十五》,光绪二十八年刊印本。转引《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第 265 页。

⑩⑨《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严复集》(五),第 1411 页。

⑪⓪《外交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五日)第 11 号,第 30 页。

⑪①《政治讲义》,《严复集》, 第 1249 页。比照原著:"Having established, then, that our political science is to be inductive, we proceed to inquire whether it can work by experiment or is reduced to depend on observation."(Sir John Seeley: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01, P22)笔者译文:"(前文已论证政治学是建构在归纳法的基础上,接下来我们探究归纳法是建构在试验有效或仅仅依据观察。)"

⑪③《政治讲义》,《严复集》,第 1254 页。此为 Sir John Seeley: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中 Lecture 2 所无。

⑪⑤《政治讲义》,《严复集》,第 1248 页。经查此为 Sir John Seeley: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中 Lecture 1 所无。

⑪⑧⑫②严复:《与夏曾佑书》,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263 页、第 263 页。